

毛主席在陕北十三年的革命活动

毛主席

在陕北十三年的革命活动

一九七四年

毛主席在陕北十三年的伟大革命实践

(根据录音整理, 不得外传)

党中央和毛主席从1935年10月——1948年3月在陕北将近13年, 在延安是10年零3个月。13年中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一年零九个月; 三个时期, 有两个战略大转变, 第一个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变到抗日民族革命战争, 第二个转变是由民族革命战争转变到国内革命战争, 这两个转变是不容易的, 经过了很多的斗争, 特别是通过了对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斗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 才实现了这两个转变。在毛主席领导下, 全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毛主席领导全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壮大了人民军队, 建设了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进行了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 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 现在许多老干部都是从延安出来的, 毛主席在这里写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 这些著作总结了世界和中国革命的经验, 同时, 指导了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在这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些胜利之所以取得是经过斗争的。

现在我就讲第一个问题: 党中央和毛主席粉碎“左”右倾机会主义,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长征的胜利是不容易的, 它战胜了很多方面的困难。第一, 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 第二, 战胜了自然界的

无数艰难险阻，比如过金沙江，过大渡河，过雪山，过草地；第三，在党内进行了两次大斗争，第一次是遵义会议，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第二次是遵义会议后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战胜了上面这些困难，长征才取得胜利的。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王明机会主义者排挤了毛主席的领导，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实行消极防御、“短促突击”。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失败，因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不得不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在长征中又是逃跑主义，当红军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后，红军遭到很大的损失，由原来出发时的八万人，锐减到只有三万来人。这个时候红军处于十分危险之中。“左”倾机会主义者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准备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设立了第五道封锁线，如果执行这个计划的话，红军可能全军复灭，因此在湖南的通道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主席提出不应该和二、六军团会合，而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左”倾机会主义者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领导了，所以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改变了方向，向贵州进军。从通道会议起，毛主席已经参加了对红军的领导。接着又召开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提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政治动员口号，当时毛主席的目的不是到贵州停止了，而是要北到四川去。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个，在红军中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再一个向当时的领导作了很多工作，说服他们，说服一些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放弃他的错误。做工作是非常耐心的、细致的，因此争取了一部分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站到了毛主席一边。首先站过来的是王稼祥同志。周总理、朱德同志也站在毛主席一边的。

因为，毛主席做了很多的群众工作，同时也做了领导的工作，这样就为召开遵义会议打下了基础。同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使革命遭到很大很大的损失，几乎把红军断送了。因此，广大指战员也觉悟到“左”倾机会主义是错误的，毛主席领导才是正确的。因此红军突破乌江以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因为当时的环境是战争的环境，所以只能集中力量主要的解决军事路线上的问题，政治路线这次没有来得及解决。再一个解决组织问题。在军事路线问题上，作出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决议》，集中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批判了他们的消极防御，批判了他们的“短促突击”，决议也阐明了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毛主席为了团结，为了革命，把政治路线问题放到以后适当的时候解决，是恰当的，是合乎于党的利益的。组织上改组了当时党的领导，选举了毛主席、张闻天、周总理、王稼祥等为书记，组织了一个以毛主席为首的，包括周总理、王稼祥三人领导小组，专门领导红军。指挥红军。这就是把当时战争环境中极其重要的问题，是红军领导权问题掌握在毛主席手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通过遵义会议，毛主席的路线在党中央得到贯彻，得到执行。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粉碎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标志着我们党由幼年时代转变成到成熟时代，保证了以后粉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保证了长征的胜利，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保证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从此，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一个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遵义会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以后，一月十九日撤离遵义，开始北上，原来的计划是从川南的宜宾地区过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

四川革命根据地。但是这个计划，遭到了破坏。在撤离遵义后，党中央和毛主席给张国焘一个电报，叫张国焘的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威胁重庆，牵制四川大军阀刘湘的部队，便于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到达四川。但是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组织了一次所谓陕南战役，他不但不往南打，反而往北打，打陕南的宁强，与中央的指示方向不一致。因此四川的军阀集中强大的兵力封锁了长江。中央红军撤离遵义，打了土城战斗，就一渡赤水，进入川南。但是，长江也被敌人封锁了，不能过长江了，不得不返回来，二渡赤水。回来打了娄山关，二进遵义城。娄山关打的贵州的军阀王家烈八个团。进了遵义城后，国民党的中央军吴奇伟马上渡过了乌江，到了遵义附近，因此，一直没有休息，又往遵义南打，又消灭了吴奇伟两个师的大部。所以遵义战役是一次大的胜利。二渡赤水以后怎么办？毛主席决定三渡赤水，三渡赤水就是为了四渡赤水，不是为了过长江到四川，而是为了调动敌人的军队。三渡赤水连回来的浮桥都准备好了。我们三渡赤水，敌人以为我们又要过长江进四川，赶快往四川调兵。当敌人往四川调兵时，我们又反过来，敌人军队往西开，我们军队往东开，交叉行进。我们四渡赤水，然后渡过乌江，直插贵阳。当时蒋介石刚好在贵阳，贵阳的兵力只有四个团，他害怕了，但又不肯跑，赶快调部队，首先调的就是云南的主力部队，这就达到了毛主席的战略目的。为了给敌人造成错觉，我们一方面作出准备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动，第二方面作出准备要攻打贵阳的行动。蒋介石赶快调部队来阻拦我和二、六军团的会合和保卫贵阳，根本没有想到我要去云南。当敌人调动了部队，我往贵阳一佯攻，虚晃一枪，马上通过湘黔公路向云南前进，渡过北盘江，直插云南的昆明。这是毛主席高度的指挥艺术，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但是林彪彭德怀等人勾结一起，攻击毛主席，说“这样兜来兜去会把红军拖垮。”

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在贵州兜圈子，把云南的主力调出来，使中央红军能胜利北上，达到了毛主席的战略目的，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毛主席的指挥是错误的。

我军占领昆明附近的嵩高后，威胁了昆明，云南的军阀龙云慌了手脚，主力部队已被蒋介石调走了，只好把各个县的民团，地方部队往昆明调。我们不打他的昆明，马上乘机北上，五月二日至九日

从绞车渡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这是毛主席指挥的高度艺术，叫做巧渡金沙江。渡过金沙江到了四川会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又攻击毛主席，林彪打电话给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行了，要你出来指挥。”他又写信给张闻天，要撤毛主席的职，党中央在会理召开了会议，批判了林彪、彭德怀等人的错误，制止了这股反对毛主席领导的歪风。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进军，强渡大渡河，过了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1936年6月在四川的懋功与红四军方面军会合。会合以后，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决议，因张国焘把四川革命根据地丢了，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向北向东发展，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八月到了毛儿盖，在毛儿盖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张国焘当时破坏党的团结，破坏红军的团结，中央作了决议，强调了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会议肯定两河口会议决议是正确的，就是要继续北上，向东北发展，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向陕北发展。毛儿盖会议后，红军组织左右两路军，红军总司令是朱德同志，总政委是张国焘，原来总政委是周总理，张国焘要当领导，毛主席做了工作，让给张国焘当红军总政委。左路军总指挥朱德，政委张国焘，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党中央和毛主席随右路军前进。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从哪里北上呢？毛主席计划是从松潘到甘南，当时松潘有胡宗南的部队，

要经过松潘到甘南，首先要打丢胡宗南，因此毛主席亲自制定了一个“松潘战役作战计划”，决定红军向松潘进攻。张国焘害怕胡宗南，不执行毛主席的作战计划，他把“进攻”改为“佯攻”，松潘战役计划给张国焘破坏了。松潘是能打下的，一是胡宗南的部队还没有完全集中，二是胡宗南的工事还没有修好。但是张国焘不敢打，这个计划张国焘破坏了，只能过草地。过草地是非常困难的，那里没粮食没人，很困难。过了草地以后，八月下旬，左路军到了阿坝，右路军到了巴西，党中央和毛主席是随右路军的。这时在左路军的张国焘野心大暴露，他借口没有解决组织问题不能北上，给在右路军的陈昌浩打了一个电报，要右路军南下，并且要陈昌浩用武力威胁党中央和毛主席也跟随南下，说不南下，就要“就地解决”，企图谋害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这个电报被在右路军的叶剑英同志看到了，立即把电报拿去报告毛主席。毛主席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就是巴西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反党的错误，决定立即率领中央红军（一、三军团），以上三打柴筹粮为名，脱离危险区，继续北上，进入陕北抗日前进阵地，组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即北上抗日支队。北上时，在右路军的陈昌浩主张派部队追打，徐向前同志不同意，说红军自己打自己，象什么话！北上的时候，四方面军的骑兵部队堵住了抗日支队的教导团，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主张打，当时毛主席批判了彭德怀这种错误的作法，因此没有打起来，胜利地脱离了危险区到达俄界。反对张国焘是从巴西会议开始的。到了俄界以后，中央给张国焘连续发了两个电报，要张国焘北上，指出他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但张不听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公开的发布了南下政治保障的布告，率领他分裂的红军向四川、西康边界退却，到了啄木碛的时候，成立了张国焘为首的伪中央，公开打出了分裂红军的反党的旗帜，九月十二

在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会后，党中央、毛主席率领北上抗日支队向陕北革命根据地进军，打开天险腊子口，渡过渭河，翻过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红军到达吴起镇的时候给陕北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吴起镇的群众知道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了，立即用鸡毛信告诉了当地的赤安中心县委，县委立即派了一个赤卫队的大队长率领赤卫队，拉了很多猪、羊去迎接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迎接中央红军。当时敌人的骑兵部队尾随着中央红军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毛主席不让敌人进入革命根据地，决定打掉这个尾巴，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在吴起和敌人的骑兵打了一仗，消灭了敌人骑兵一个团，打倒了尾随红军的尾巴。这是党中央到陕北的第一仗，也是第一个胜利，有很大的意义的。

张国焘南下以后向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又执行错误的民族政策站不住脚，他提出“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的口号，结果在北仗关一仗，四方面军的主力损失很大，因此他不得不反过来第二次北上。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曾电令张国焘改正错误，回到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但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的错误，因此，一九三六年一月，党中央向党内公布了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错误，和俄界会议的决议，借以教育全党，特别是教育和争取四方面军的干部。一九三六年六月，北上的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四川的甘孜会合。会合以后，张国焘的野心仍然不死，他企图拉拢二方面军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他拉拢的办法是很阴险的，一方面送一些好东西，另一方面封官许愿，这是一般宗派主义都采取的办法。但是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要跟毛主席走的，他们没有同意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分裂路线。他们为了北上和毛主席会师，并且他们作了斗争和工作，促进四

方面军的北上。在四方面军里面的朱德同志、刘伯承同志与张国焘也作了斗争和工作，要北上。由于张国焘南下遭到失败，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也要求北上。这时，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二、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后，立即打电报给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要他们北上，并指示北上的路线，介绍了沿途的敌情。中央指示得到了四方面的广大指战员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张被迫取消他的伪中央，和二方面军北上，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到达甘肃以后，张又继续坚持他的退却逃跑主义路线，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从甘肃的静远地区西渡黄河，打出新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借口，实际上是张国焘企图到青海、新疆建立一块根据地，好称王称霸。但是四方面军只过去二万多人，桥给敌人飞机炸掉了，渡口被国民党的部队封锁了，四方面军有五个军，过去三个军，还有二个军没有去，陈昌浩过去了，张国焘没有过去。过去的二万多人，组织所谓西路军，组织了所谓“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为主席。四方面军的西路军打到祁连山山区，被敌人的骑兵部队打得很惨。经过高台、古浪战斗，西路军基本被打垮，只有七、八百人，在李先念同志率领下突围到新疆和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党中央派人把他们接到新疆，1937年的年底，才从新疆回到延安。西路军完全失败。毛主席说“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是张国焘路线、退却逃跑路线最后彻底破产了。四方面军没有过河的那一部分和中央红军会合了。1936年的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全国三个主力红军在甘肃的会宁会合，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从此全国的三个主力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增强了抗日的力量，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发动抗日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三支主力红军的许多干部，今天还是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领导干部。

红军的长征从1934年10月开始，到1935年10月结束了。王明路线实行的结果，就是二个二万五。一个就是走了二万五千里，第二个就是全国革命根据地失败了百分之九十，三十万红军留下了二万五千人。但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人虽然是减少了，由于路线正确，我们的队伍的质量提高了，更加精干，更加有力量了。长征从结束来看，是有伟大意义的。毛主席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长征以后，对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必须进行批判，所以在1937年3月份到4月份，在延安开展了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批判。这次批判一方面是为了教育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使他们回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挽救张国焘本人。批判是说理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来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揭发他的错误，批判他的险害性。这里毛主席因此作了大量的、细致的政治工作。在批判过程中有扩大化，关押了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同志，这种作法毛主席知道了以后，亲自到监狱里面去看四方面军的同志，亲自放人，把四方面军被关的同志从监狱里放出来，许世友同志就是毛主席亲自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还有在分配干部上，对四方面军的同志有歧视，这个情况反映给毛主席，毛主席给作工作，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的同志都一样，都是党的干部，要对四方面军的同志应该一事同仁。四方面军从新疆回到延安的七八百人，毛主席进行了亲切接见，一个一个给从新疆回来的四方面军的同志谈话，给他们说明张国焘的错误，教导他们，鼓励他们很好的为党的工作继续努力。所以毛主席在批判张国焘的过程中作了大量的工作。由于纠正了这些错

误，批判了张国焘，取得了很大成绩。所以到四月份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现在我们粗略地说一下他的错误的內容。

毛主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业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毛主席又说：“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內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宗合。”现在我们根据毛主席讲的，把张国焘的错误分析一下。

第一个，我们讲一讲张国焘退却路线的根源，也就是毛主席说的“为敌人所吓倒。”

我这句话不知对不对。我认为他这个人，一个是腿长，为敌人所吓倒，跑得快；一个是手长，就是野心很大。

张国焘第三次反“围剿”以后，提出一个“偏师”说，他认为第三次反“围剿”以后，国民党没有什么力量了，进攻红军的主力军是帝国主义了。在这种认识下，第四次反“围剿”中，他要冒险去打武汉，结果没有打下，受了一点损失，他就被敌人吓倒了，不是在鄂豫皖坚持斗争，逃跑到川陕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时间，当时敌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剿”。“六路围剿”是被粉碎了，取得胜利。但是他被刘湘等四川军阀的“六路围剿”吓倒。所以又退出四川革命根据地，向四川、西康的边疆逃跑。红军长征以后他看到红军受到了损失，他认为红军已经完全失败了，革命再不会有高潮了，他连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引起的全国革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这种革命力量，也看不起，轻视这种革命力量，他被国内外敌人的进攻所吓倒，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了。张国焘就是这样一个人极端的例子。他的退却路线就是这样产生的。

第二个，讲一讲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前面已经讲了，他从鄂豫皖

跑到四川，从四川又跑到西康边界少数民族地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他提出两个退却路线：一个是向四川、西康的边界地区进行退却，到了阿坝以后又南下；第二次是三大主力会师以后，他又退却逃跑，向青海、新疆回族地区退却逃跑。这个退却路线与毛主席的北上抗日路线是对立的，是退却逃跑还是北上抗日是党内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为什么说是两条政治路线斗争呢？因为1935年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吞并了我们的东北四省，而且继续向华北进犯。在1935年的5月份，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提出来要统治整个华北，当时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所谓“向梅协定”出卖了河北、察哈尔大部份权力给日本帝国主义。民族矛盾上身为主要矛盾的这种情况下，谁来扛起抗日的大旗呢？也就是由谁来领导抗日战争？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事。只有共产党能够扛起抗日的大旗，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抗日。所以不能退却逃跑，只能北上升日到陕北。因为陕北过了黄河就是华北，陕北是抗日的前进阵地。只有到陕北，才能够领导抗日。到了陕北，从此作前进阵地，才有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东北这样革命的大局面。退却到少数民族地区，那里人口少，经济落后，对全国革命没有政治影响，远离抗日前线，不能够领导抗日就不能发展革命形势。所以是退却逃跑还是北上抗日到陕北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

第三点，讲一讲他的军阀主义。

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非常严重，他是不看谁的路线正确，而是看谁的枪杆子多，他是以枪杆子指挥一切，他根本不重视红军里面的党的建设，不重视红军里面的政治委员制，他也不重视地方党的建设，他甚至以枪杆子来搞恐怖政策。威胁了，威胁群众。在全国三次搞肃反扩大化最严重的地区，一个是他的鄂豫皖，第二个是湘鄂西，第三个

是陕北革命根据地。陕北根据地是受了他的影响。搞恐怖政策，搞军阀主义。特别严重的，他以枪杆子来企图改组党中央，发展以枪杆子来企图暗害党中央，暗害毛主席。在延安，毛主席针对张国焘的错误，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第四点，讲一讲他的反党行为。

反党行为我们讲主要的。一九三五年六月在懋功会师以后，他看到他的枪杆子多，一方面军的枪杆子少，他就提出来要改组党中央，企图把他的人安排当党中央委员。结果也没有答应他。到毛儿盖的时候，他又提出要担任军委主席，结果没有答应他，但给了他一个总政治委员。到阿坝的时候他又提出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所谓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他阴谋改组党中央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他从阿坝以后就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党反中央，自己成立一个伪中央。第二次北上以后他坚持不改变他的错误，组织所谓西路军，继续分裂党，进行反党的活动。所以张国焘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他的罪恶是非常大的，应该进行批判。

延安四月会议张国焘本人参加了，张国焘在会上作了几次检讨，他表面哭哭啼啼，承认错误，并且声明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但是张国焘要两面派，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批判了，他检讨了，党中央给他以悔改的机会，叫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重要职务。但是张国焘随时准备叛党。一九三八年十月，他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跑到了中部（黄陵）去祭黄帝陵。他利用这个机会跑到西安，找到了他最害怕的胡宗南，接着，在胡宗南的保护下逃跑到了武汉。到了武汉以后，党中央想了很多办法去挽救他，但是他拒绝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挽救，在四月十七日正式投靠了蒋介石，当了一个特务，专门干破坏共产党

原
书
缺
页

的特务工作。所以在四月十八日，党中央正式公布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张国焘就这样成了极可耻的叛徒、特务。

第 四 个 问 题

纠正“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粉碎敌人的
“围剿”，挽救陕北革命根据。

反党分子高岗说：“陕北救了中央”。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到陕北的时候，陕北革命根据地内部有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外部有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陕北处于十分危急之中。毛主席和党中央到了陕北，一方面纠正了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另一方面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这样才挽救了陕北。

现在我们讲第一个问题，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陕北在一九二四年开始有了党的组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领导了陕北的革命群众运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八七会议”的方针指引下，刘志丹同志领导了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由于没有正确路线的指导，失败了。失败以后，刘志丹等同志回到陕北搞游击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建立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这都是在毛主席建立根据地的正确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陕北有两块革命根据地，一块是陕甘边根据地，是刘志丹同志领导的，有陕甘特委、有陕甘工农革命政府，有红二十六军，军长是刘志丹。还有一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有陕北特委，有陕北工农革命政府，有红二十七军。两个革命根据地，领导关系不一样。陕甘边区属陕

西省委领导，陕北革命根据地属北方局直接领导。由于革命发展的需要，在一九三四年北方局将两个革命根据地、两个特委、两个工农革命政府、两个红军统一起来，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了统一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是刘志丹同志。一九三五年一月，谢子长牺牲了，刘志丹同志从陕甘边到了陕北，加强了统一领导。在刘志丹同志领导下，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把两个根据地打成一片。正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时候，北方局派来了一个钦差大臣，叫朱理治，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到达陕北。他来了以后，不是贯彻执行遵义会议后的路线，而是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同陕北的郭洪涛结合在一起，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路线的内容：

一、他们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我们是优势，敌人是劣势。他们说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加在一块都是个劣势。事实是当时敌人已经开始第三次“围剿”了，敌人在整个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就有十万，我们的军队连正规红军和地方部队加在一块还不够二万人，他主观主义的说我们是优势，敌人是劣势，实际上是敌强我弱。在他们对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下，产生了一系列的“左”倾错误。

二、在军事上，他们提出要以洛川为中心，向三边发展。再一个他们提出来要打通国际路线，陕北那么一点点红军，要打通国际路线，要打到蒙古，和苏联接起来。还有一个口号要打中心城市，陕北那有个中心城市？就打县城，要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要打中心城市，要打通国际路线，要以洛川为中心，向三边发展。还提出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铜川）、耀县、富平、泾阳发展；要巩固宜川，向韩城一带发展；要争取神（木）府（谷）与绥（德）吴（堡）以南的苏区